

数智时代青年群体数字素养 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 崔 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本文对青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从信息识别素养、数字社交素养、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维度讨论了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基于数字素养的“就业适应”能力为劳动者带来了更强的就业自主性,助力青年群体通过自主创业等形式实现更为多元的劳动就业。基于此,数智时代青年群体创业支持政策应当从数字素养赋能的角度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加快建立对青年创业者数字素养的全方位、全体系赋能机制,加速青年数字素养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转化。

【关键词】数智时代 创业意愿 数字素养 创业支持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10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系统性重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同时,也正在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和劳动技能的内涵也在被新技术重新定义。在技术进步与技能需求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不论是从技能偏向技术进步的视角,抑或是从资本深化的视角来进行解释,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是嵌入到科学发展过程之中的,拥有与最新技术相匹配的劳动技能可以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1-2]。

在技术变革持续加速的数智时代,数字素养对于劳动者提高技能适配性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数字素养的内涵正在超越传统

收稿日期:2024-05-09

作者简介:崔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和202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应用对策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意义上以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为核心的数字技能,全面转向以对数字技术的深层次了解和应用能力为核心的数字行动素养和人机协同素养,数字素养在人力资本中的重要性也正日益凸显。在这一技术变革进程中,数字素养作为青年在数智时代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已经成为衡量个体人力资本高低的重要指标。在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的数智时代,数字素养在助力青年群体实现更高质量创新创业中起到何种作用,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的就业创业意愿,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以青年群体数字素养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联为焦点,从数字素养的不同维度对青年创业意愿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依据

(一)“数字素养”概念的缘起和意义的变迁

在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数字素养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从数字素养概念的缘起来看,吉尔斯特(Gilster)在1997年首先提出,数字素养不同于其他技术类型的素养,并强调数字素养是对数字信息进行阅读、理解、整合和评判的综合能力^[3]。马丁(Martin)等则提出数字素养是一种发展性技能,并进一步将数字素养划分为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获取数字资源、构建新知识和新资源三个层次^[4]。在政策层面,欧盟在2013年发布了《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 1.0),至今已经将DigComp更新到2.2版本(见图1)。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最初的数字素养框架中,主要包括信息与数据、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数字安全、问题解决五个素养领域。在《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版本中,则增加了与职业相关的专业数字素养和技能以及对各类软硬件的知识与操作能力。该版本的修订重点强调了人工智能相关数字素养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出在新技术快速发展情况下,数字素养的内涵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认知能力和应用能力,转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人机协同能力^[5]。

近年来,我国在数字素养与技能建设上持续提速。根据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21年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数字素养与技能被界定为: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其中数字素养在涵盖专业技能外,强调人们创造性地理解、分析、评估、管理和处理数据信息的综合水平和素质底蕴。这是我国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确对数字素养进行概念界定,也反映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力提高全民数字素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数字素养的理论框架和指标构建层面来讲,学界也在近年来开展了诸多讨论^[6]。例如,有学者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将数字素养框架界定为知识与认知、实践与参与、情感与价值三个维度^[7]。有学者则借鉴欧盟对数字素养概念的解析,从数字信息沟通素养、数字内容创建素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四个维度综合测度数字素养^[8]。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以ChatGPT技术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素养有了全新的内涵,从最基础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训练技能,数字素养正在成为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必备的核心能力,也是劳动者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素质。特别是

近年来新职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也反映了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型信息技术正在重新形塑就业市场的劳动关系,数字素养在劳动者技能结构中也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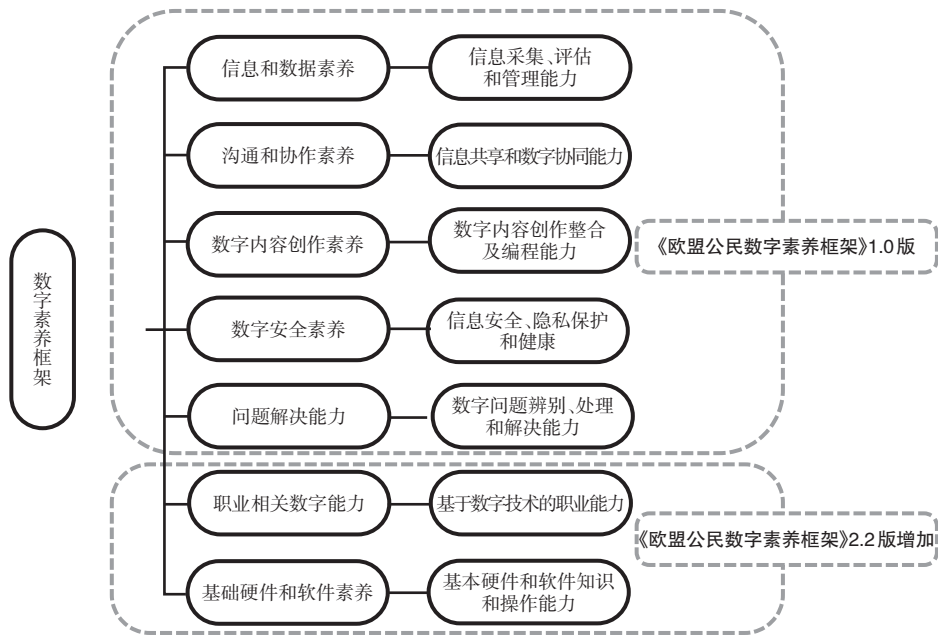


图1 《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对数字素养维度的界定

(二)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意愿影响的相关研究及本文的研究重点

在青年创新创业的相关研究中,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青年群体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影响效应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高数字人力资本青年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创业和自媒体创业已经成为青年创业的主流^[9-10]。但是在青年群体创业过程中,以互联网应用能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为表现的数字素养匮乏,成为限制青年高质量创业的瓶颈性因素之一^[11]。同时,青年群体面对新型互联网资源分布结构,适应力不足和资源获取能力不强,更制约了青年群体创新创业实践中成功率的进一步提升^[12-13]。面对这一现状,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影响效应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探讨,对“数字素养”“数字人力资本”等概念也从就业创业层面开展了持续的讨论。例如,有研究表明,数字素养对劳动者实现创业有着无差异化的促进效应^[14];也有研究发现,数字人力资本对于中高技能创业者具有显著的影响^[15]。

总体来看,在国内外学界对青年创业选择和意愿影响效应和机制的研究中,从数字素养角度分析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研究较少,对于数字素养如何影响青年群体创业选择,更缺乏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在涉及数字素养和青年群体创新创业的研究中,数字素养通常被视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数字素养的内部结构以及哪些维度会影响青年群体的创新创业,则鲜有分析。与此同时,在新型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数字素养对不同行业、不同就业岗位的青年群体在创业意愿上的差异化影响,也同样缺乏充分的系统分析。

因此,在学界对青年数字素养和创新创业关联机制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数字素养的视角,

讨论数智时代新型人力资本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对于数字素养,本研究进一步将其界定为数字信息识别素养、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亲缘社交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以此对数字素养进行测量,并基于上述几个维度的数字素养如何影响青年群体创业意愿展开讨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23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该调查采用多阶段PPS概率抽样,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城市乡村,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青年群体,即年龄在18-35岁之间、有从事非农就业的群体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含缺失值的样本,最终保留有效样本1844个。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创业意愿。在问卷中相应的题目设计是询问被访者是否有意愿创业,在模型中则对有创业意愿的被访者编码为1,无创业意愿的则编码为0。本研究的重点是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从变量设计的角度来说,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数字素养”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问卷设计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数字素养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指标体系设计,加入了数字素养相关维度测量的模块。在具体分析中,通过对数字素养相关问题累加后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信息识别素养、数字社交素养、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变量。其中,“信息识别素养”主要包括“是否能使用百度、360等工具搜索信息”,“对来路不明的网上信息、视频等,是否知道如何核实其来源和判断真实性”;“数字社交素养”包括“数字亲缘社交素养”(即通过互联网与亲友进行社交活动的频次)、“数字业缘社交素养”(即通过互联网与同事、合作者、商业伙伴等进行社交活动的频次);“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包括“使用互联网进行投资、商务或者工作的频次”“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与社会参与的频次”“通过互联网创作、发布文本、图片和音视频的频次”“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观点表达的频次”等;“人机协同素养”则包括“工作中使用互联网的频次”“工作任务和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替代关系”等。

同时,在本研究中,在讨论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机制中,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户籍、平均月收入、工作满意水平、现在工作所在的行业等。主要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样本主要变量基本描述统计分析(N=1844)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描述统计
因变量			控制变量		
是否有创业意愿	百分比		平均月收入	均值	8511.65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描述统计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有创业意愿	26.77	职业分布	百分比	
	无创业意愿	73.23		社会团体和组织/企业管 理人员	4.63
	标准化中位值			专业技术人员	22.04
	数字信息识别素养	-0.014		一般办事人员	9.95
	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 素养	-0.038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人员	44.94
	数字亲缘社交素养	0.282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16.53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	-0.193		不便分类人员	1.91
控制变量	人机协同素养	0.059	百分比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3	
性别	百分比		建筑业	6.57	
	女性	48.78	制造业	22.93	
年龄	男性	51.22	行业分布	采掘业	0.44
	均值	29.41		生产型服务业	19.23
农业户籍	百分比	59.06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10.00	
受教育年限	均值	12.81	接触型居民服务业	16.91	
工作满意度	均值	7.41	公益服务业	22.60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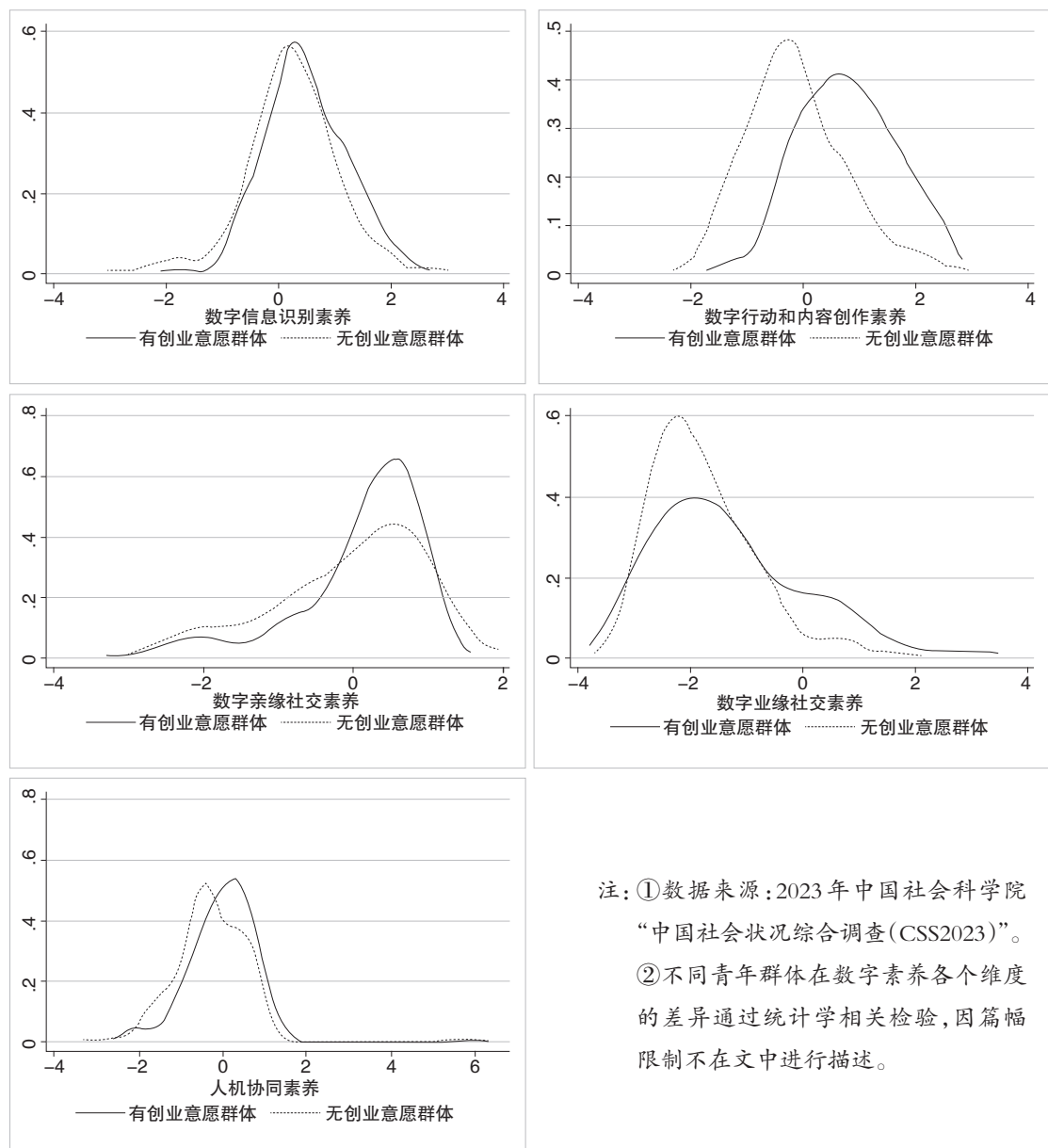
四、研究发现

(一)不同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数字素养水平的差异分析

在界定数字素养的概念及其维度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不同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数字素养水平差异进行讨论。通过数字素养不同维度的核密度概率分析可以发现,有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在数字素养各个维度上显著高于无创业意愿群体,特别是在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方面,有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显著拥有较高的数字素养(见图2)。上述结论通过相关统计检验,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因篇幅限制,在正文中不展示具体统计检验过程和结果。

进一步来看,从数字信息识别素养和亲缘社交素养来看,这两方面的数字素养在不同创业意愿青年群体中分布差异不大。但是在当前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的背景下^[16],互联网接入能力和信息鉴别能力,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日常性亲缘社交能力,已经不具备劳动力市场上的核心技能溢价。而与之相对应,不论是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抑或是人机协同素养,均对于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创业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以及人机协同素养,已经成为劳动技能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从“技术-经济范式”视角看,数智时代下的劳动者是否能够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劳动者是否拥有与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下的数字经济相匹配的能力结构^[17-18]。正如布莱恩·阿瑟在其著作《技术的本质》中指出的:“经济涌现于它自身的安排和自身的技术,经济就是它自身技术的表达”,并且“当一个新的技术进入经济,它会召唤新的安排——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模式”^[19]。在数智时代,较高的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有助于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更高效地获取信息、整合资源、创造价值,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重新规划个人职业发展路径,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较高的人机协同素养则体现出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范式变革背景下的就业韧性和就业适应能力,拥有人机协同素养的劳动者暴露在脆弱就业和劳动降级下的风险也就更低^[20]。



注:①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
②不同青年群体在数字素养各个维度的差异通过统计学相关检验,因篇幅限制不在文中进行描述。

图2 不同创业意愿青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分布

数智时代下的社群网络和人际圈层结构正在被新型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全体系重塑。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在“强关系—弱关系”、结构洞和社会资本理论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在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对个体经济社会生活的作用机理也不尽相同。强弱关系理论认为,以业缘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弱关系的特性,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弱关系因其社会网络和连接节点的异质性,有助于提高个体信息来源的多源性和丰富性,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流动的现代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以业缘形成的弱关系对个体接触有价值信息、提升素质与能力、获取技术与资金等有着重要的作用^[21-22]。因此,在数智时代,具备与技术发展相匹配的数字业缘社交素养,有助于个体通过构建弱关系,更为精准地发现结构洞、融入社群、突破人际圈层,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扩展。

因此,从不同创业意愿的青年群体来看,其在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方面的数字素养分化较为显著。这一分化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时代,将进一步放大个体间、群体间的劳动技能差距,以及劳动者在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上的差异^[23-24]。

(二)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在对青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初步分析基础上,我们通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见表2),进一步讨论数字素养各个维度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创业意愿,核心自变量则为数字素养的各个维度。

模型一包含基础性控制变量和劳动者职业类型。其中,我们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为基础,将职业整合为4类,即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Logistic 模型回归系数显示,性别和对数月收入对创业意愿呈现出正向的影响效应;而受教育年限和总体工作满意度则对创业意愿呈现出负向的影响效应。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劳动者职业类型这一变量来看,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业人员在创业倾向上要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的青年群体。

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行业从业的青年群体在创业意愿上的差异,模型二中的自变量则包含基础性控制变量和劳动者所在的行业类型。就行业分类来看,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分类标准,将劳动者所在的行业划分为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它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其它行业等类型。具体分类参考的文件包括:《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的通知》(国统字〔2018〕111号)、国家统计局第36号令中的《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通知》(国统字〔2019〕44号),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从模型系数可以发现,当劳动者所在的行业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或者是其它服务业时,其创业意愿要显著高于其它行业。

在模型三中,除了基础性控制变量,我们进一步加入了数字素养这一核心自变量。从 Logistic 模型可以看出,数字化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数字素养均对青年群体选择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具体统计系数详见表2。

表2 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选择影响效应的逻辑回归模型 (N=781)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常量	-1.173	0.681	-0.750	0.525	1.908	0.965
控制变量						
非农业户籍	0.158	0.119	0.153	0.116	0.132	0.187
男性	0.731***	0.120	0.722***	0.110	0.788***	0.176
受教育年限	-0.077***	0.020	-0.090***	0.016	-0.131***	0.031
月收入(取对数)	0.140*	0.072	0.138*	0.069	-0.061	0.101
总体工作满意度	-0.097***	0.028	-0.103***	0.026	-0.128***	0.031
核心自变量:数字素养						
数字信息识别素养					0.003	0.112
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					0.241**	0.100
数字亲缘社交素养					0.008	0.081
数字业缘社交素养					0.286***	0.070
人机协同素养					0.310*	0.138
工作任务类型(参照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0.355**	0.141			0.312*	0.120
一般办事人员	0.026	0.226			0.013	0.215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0.109	0.191			0.095	0.211
行业类型(参照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						
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			0.516	0.486	0.356	0.311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0.821*	0.367	0.571	0.465
其它服务业			0.721*	0.359	0.381	0.291
其它行业			-0.129	0.442	-0.219	0.389
其它控制变量	——	——	——	——	——	——
Pseudo R 平方	0.095		0.143		0.151	

注:①***表示在0.001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表示在0.01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表示在0.05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②回归模型中的其它控制变量,例如被访者所在地区、婚姻状况、政治身份等变量,因篇幅所限,没有在正文中展示;③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3)”。

从上述统计模型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素养对青年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效应,具备高层次数字素养的劳动者有着更高的创业意愿。一方面,数字素养中的数字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已经成为数智时代劳动力市场所高度需求的核心技能,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下,具备最前沿技术应用能力的劳动者将在行动能力、创造能力、社会资本拓展能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可能对数字技术落伍者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在全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的高阶形态必将对就业结构进行全体系重塑。在职业类型中,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从业劳动者有着更高的创业意愿。与此同时,从行业视角来看,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中界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服务、现代服务业的从业者,同样有着更高的创业意愿。从职业和行业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就业的劳动者,其工作内容以“知识型”“创意型”“互动性”“情感型”劳动为主,并且这部分劳动者通常具有较高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这类劳动从本质上体现了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劳动任务引发的就业范式的变革。正如弗里兰在其著作《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中所述,当知识成为生产投入的主要要素时,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再需要机构和组织,劳动者有了更大的自主性^[25]。这就从劳动关系层面为以自主创业、平台就业等形式为主的更为柔性的新就业形式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可行性。换言之,数智时代创业背后的深层逻辑已经超越了基于职业进阶的理性选择,而转变为宏观层面“技术—经济范式”迭代升级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匹配,以及微观层面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结构转型下对劳动关系的自主性重塑。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有流动性和柔性。李明桦等提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不再受限于特定“空间”和特定“组织”,具备高层次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正在形成基于数字素养的通用技能和专业技能,使其有着打破职业行业壁垒和传统雇佣关系的能力^[26]。以“数字灵工”“数字游民”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的不断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科技正在为青年群体创业提供更为丰富的形态和路径。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进一步从数字素养对青年群体创业意愿影响效应视角展开学理讨论和政策分析。

(一)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劳动者的同时,改变了创业的深层逻辑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带来颠覆式创新,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更是以全体系重塑的方式开展。一方面,数智时代中的“流动的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劳动就业领域,在现代性框架内的雇佣关系正在经历由“固态”向“液态”的重大转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效应”或“创造效应”,更不是对就业岗位简单的加法或减法,其真正深远的影响在于对现有工作任务的解构和重构:可以高度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就业任务被剥离,对于人工智能依赖程度较低或需要较高水平“人机协同”的工作任务则被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岗位任务。新岗位任务从业者也因其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过程中不断增强的人机协同能力,实现了劳动技能的升级,具有更强的“就业适应”能力。从“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数字素养的“就业适应”能力为劳动

者带来了更强的就业自主性,在传统的以“雇主—雇员”为核心的劳动关系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数字赋能下具有了更强的构建劳动关系的自主性和选择权,可以通过自主创业或平台就业等形式实现更为多元的劳动就业^[27]。通过本文中的模型分析就可以看出,有创业意愿的群体在数字素养的各维度均高于无创业意愿的群体;并且数字化行动和内容创作素养、数字业缘社交素养、人机协同素养等维度的数字素养越高,创业意愿也就越强。同时,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业的劳动者,其选择创业的意愿也显著高于其它行业的从业群体。

因此,不论是从就业岗位的“替代—创造”视角,抑或是工作任务的“解构—重构”视角,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对劳动者实现技术赋能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劳动就业形式和创业选择的深层逻辑。在数智时代,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或淘汰的就业岗位或工作任务的从业者,必然具有更强的数字素养和人机协同能力等可迁移技能。这一可迁移技能不仅为劳动者实现职业间、行业间就业转换提供了可能性,更为劳动者突破传统劳动关系、实现创新创业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二)新技术在重塑“资源—机会”的分布结构的同时,也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业空间

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如何增强资源获取能力、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并实现两者的高效匹配,对于创业选择和创业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塞蒙(Sirmon)等在资源编排理论(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中从资源结构化、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三个维度对“资源—机会”识别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并且认为资源与机会在分布特征上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排他性^[28-29]。而在数智时代,劳动者获取、占有以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代表的创业资源的模式出现了显著的转向,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资源—机会”分布、识别和匹配新机制,为普通劳动者实现创业成功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

第一,就经济资本而言,从博客到微博,再到Bilibili(哔哩哔哩)和抖音,互联网新技术在重构个体和社会链接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经济资本的分配方式。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本结构与分布模式,在数智时代以流量和注意力为代表的无形要素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普通劳动者则具有了对于分布于各地和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高效整合的能力;从注意力经济、平台经济,再到流量经济,新科技已经为经济资本的获取和占有开启了全新的路径。特别是在以“流量型经济”为代表的新发展形态中,如何成为各类要素资源的“流量节点”,如何依靠数字行动与内容创作素养,对以“无形要素”为主的资源进行链接和整合,对创业者的职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0]。

第二,在流量型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利于普通劳动者实现成功创业的社会资本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弱关系的优势》中提出了关系强度理论,并提出了弱关系优势假设^[31]。数智时代的网络社会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为丰富且异质性更强的弱关系连接,并且为普通劳动者成为不同圈层连接的枢纽节点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与此同时,依托于互联网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着更高的关联程度,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也更强。普通劳动者在创业过程中对经济资本的获取不再囿于亲缘、地缘关系,而且基于线上社群的弱关系连接具有巨大的经济增值效应。因此,具备网络社交中的弱关系连接能力,不仅能够高效实现社会资源和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匹配,更提高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基于流

量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布结构,可以助力普通劳动者突破资源禀赋约束和时间空间限制,通过提高数字素养和数字行动与创作素养,激活、扩展优势要素资源,助推个人职业发展转型。

(三)数智时代青年群体创业支持政策应当从数字素养赋能的角度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适配性

从政策层面来看,近年来针对促进青年群体高质量就业创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于营造良好创业环境、拓宽创业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面对数智时代青年创业群体新特点和创业新模式,相关支持政策在精准性和适配性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极大助力了青年群体在创业形式上实现以微创业、轻创业为特征的轻资产创业,“在线”和“远程”已经成了当代青年创业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随着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创业模式也正呈现出显著的知识型、创意型转向,对于传统的创业要素,例如资金、场地、设备等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而从当前各级政府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政策来看,一般仍以发放创业补贴、减免办公场地租金、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为主。因此,要进一步增强数智时代青年创业政策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可以在以下方面完善相关政策。

第一,应当以全面提升青年群体“数字素养”为导向,实现对青年创业者数字能力和数字技能的持续性赋能。特别是随着新型数字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如何助力青年创业群体实现数字素养的持续更新和旧知识的及时“换档”,跟上数字技术快速升级的步伐,应当成为政策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的重要维度。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协同社会各方资源,为青年创业群体建立贯穿创业全程的数字素养培训和数字创业指导,助力青年创业者实现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第二,应当建立对青年创业群体数字素养的全方位、全体系赋能机制,加速数字素养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转化能力。从前文分析可见,数字素养的内涵包括基本素养、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三个层次。青年创业者只有在数字素养的三个层次上不断进阶,才能实现高质量创新创业。因此,应当进一步建立青年数字素养的全方位赋能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中更加突出与数字素养相关的能力建设,在普及基本素养、提升通用能力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现青年创业群体数字素养中高层次数字专业能力的提升,助力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创新创业。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1).
- [2] Acemoglu, D., Autor, D.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2011, pp.1043-1171.
- [3] Gilster, P. Digital Literac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8, pp.2-50.
- [4] Martin, A., Grudziecki, J. DigEuLit: Concepts and Tools for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s*, 2006, (4).
- [5] Vuorikari, R., Kluzer, S., Punie, Y. DigComp 2.2: The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pp.6-49.
- [6] 陈怡君:《国内数字素养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7] 包晓峰:《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数字素养框架建构》,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年第8期。
- [8] 周丽娟 范 韧 徐顽强:《数字素养对新型职业农民参与电商行为的影响》,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9] 冯 明:《“互联网+”时代农村青年电商创业实践研究》,载《青年探索》,2017年第3期。
- [10] 程志超 张怡心 吴印博 徐艺文:《青年自媒体创业的SWOT分析及创业策略选择》,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11] 黄敬宝:《青年创业者的素质及其培养——以安徽省为例》,载《中国统计》,2018年第12期。
- [12] 于 陶:《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助力青年创新创业》,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26期。
- [13] 张建平:《网络环境下青年创业资源获取及其影响》,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0期。
- [14] Chalmers, D., MacKenzie, N.G., Carter, 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Implications for Venture Cre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1, (5).
- [15] 李 颺:《互联网与创业——基于北京市青年创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5期。
- [1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3.cnnic.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 [17] 杨青峰 李晓华:《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结构、制约因素及发展策略》,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18] 杜传忠 疏 爽:《人工智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成效与政策取向》,载《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2期。
- [19]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 王 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 [20] 赵恒春 张文博:《人机协同影响就业质量的机理探寻与实证检验》,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 [21] 黄春燕 蒋乃华:《社会资本对农民就业转移影响的理论分析》,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22] 朱启彬:《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工程移民乡土关系性质的再考查》,载《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 [23] 孙 榕 李白杨:《生成式人工智能(GAI)背景下的新型数字鸿沟识别框架研究》,载《图书情报知识》,2024年3月25日。
- [24] 陈斌开 徐 翔:《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平:国际经验、影响机制与公共政策》,载《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5月22日。
- [25]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周 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 [26] 李明桦 檀 林:《数字游民时代:零工经济下“斜杠青年”零成本创业的新常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8页。
- [27] 陈明鑫:《信息技术影响就业模式的路径与机制》,载《特区经济》,2019年第9期。
- [28] Sirmon, D.G., Hitt, M.A., Ireland, R.D..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1).
- [29] 孙永波 孙 琿 丁沂昕:《资源“巧”配与创业机会识别——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年第2期。
- [30] 石良平 王素云 王晶晶:《从存量到流量的经济学分析:流量经济理论框架的构建》,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 [31]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6).

(责任编辑:张 丹)